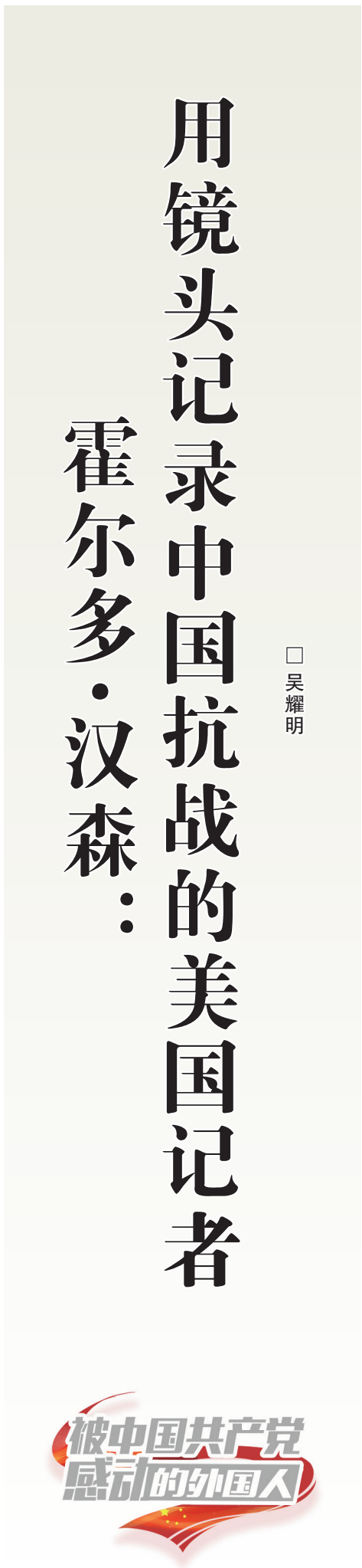




霍尔多·汉森（1912—1992年）是20世纪30年代来中国的美国记者，拍摄了很多反映抗战时期中国军民面貌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照片，用镜头真实记录了日军的侵华暴行和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1912年，汉森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1934年从卡尔顿学院毕业后来华。1938年汉森访问了晋察冀、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用相机给他们拍下了许多珍贵照片，在中外报刊上发表了許多介绍中国抗战的文章，向全世界发出了中国人民正义的声音。

用镜头记录卢沟桥事变

1934年，汉森来华后，一边从事翻译、教师、记者工作，一边学习中文，接触到中国社会多方面信息。他看到国民党抓捕、监禁、杀害爱国学生时，愤恨到极点，觉得这是一种极为可耻的罪行，认为左翼学生充满活力，富有理想。到红军离开后的江西苏区采访时，看到当地农民抱怨在国民党统治下税收和地租太高、高利贷太可怕，虽然红军已经转移，但人们依然非常敬重共产党。他认识到，“红军领导人将群众组织起来，给他们规定了纪律，并指出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这是一场反抗封建统治的运动”。

1936年底，汉森开始参加埃德加·斯诺夫妇在北平家中组织的教授和记者们的聚会，了解更多关于红军长征的信息。1937年7月，汉森加入美联社战地记者部，用拍摄的照片和新闻报道真实记录了中国军队对日军侵略的抵抗和战争的惨烈场面。卢沟桥事变前夕，他和合众社记者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作者）来到卢沟桥搜集资料，拍下了战前卢沟桥的照片。7月28日，日军向南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汉森第一时间骑车前往，用相机拍下了战场惨烈场景，他拍的照片中就有后来广为流传的“赵登禹遇难照”。汉森不顾生命危险亲临战场，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了日军的残暴和中国军民的抗争，践行了他“记者就要去危险的地方”这句豪言壮语。



首位进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外国记者

1938年5月，汉森到冀中抗日根据地采访，成为首位穿过日军封锁线访问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吕正操接待了他，向其介绍冀中根据地发展情况。汉森在安平参观了修械所，观看了士兵训练、群众集会和剧团的抗战演出，近距离接触了根据地军民的日常生活，所到之处常能看到士兵赶着军马帮助农民耕地，他写道，“战争期间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脸上洋溢着真正的快乐”，“第一次看到中国有重新夺回失去土地的机会”。

6月，汉森受邀再访冀中，在蠡县、安平、安国等地，见到了日军的烧杀抢掠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历险躲过了日军的空袭轰炸，经历了八路军歼灭驻安国日军的全过程。用照相机拍下了日军轰炸、烧毁中国人房屋后一片废墟的惨象，用铁的事实回击了日方对暴行的狡辩。

7月，汉森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五台县，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热烈欢迎，聂荣臻向他介绍了八路军的斗争策略。在这里汉森还遇到了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和布朗，他与白求恩交谈至深夜，白求恩对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期待像你这样的人，能据实报道和提供一个平衡、中立的角度……中共已牢牢地掌控了群众运动，而群众就是中共未来的政治力量”。汉森参观了松岩口后方医院，并和白求恩、布朗一起合影，也为两位加拿大医生留了珍贵的合照。汉森和布朗一起前往山西屯留故县，见到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彭德怀对近期抗战战绩做了介绍，指出八路军发展壮大原因在于动员群众。

第一个报道《论持久战》的西方记者

8月，汉森一行到达西安，9月，同彭德怀、邓小平、林伯渠同行从西安前往延安。在延安，汉森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也与丁玲、沙可夫、沙汀等鲁艺作家、艺术家进行了交谈。汉森还在延安一家烤鸭店宴请了王震、徐海东、贺龙、谢觉哉、罗荣桓、萧克等人，为他们拍下合影，在当时的中外报刊广为传播。

在延安的两周时间里，汉森分别采访了朱德和毛泽东。朱德表示：日军只是占领了像蜘蛛网一样的铁路和铁路沿线大城市，而铁路间的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在中国人的控制中……中国的机动部队能够从当地得到粮食和武器弹药的补给……控制农村和粮食补给的军队一定能战胜只控制铁路的军队……我们相信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汉森对毛泽东的采访是从晚上8点半开始的，一直持续到午夜1点，毛泽东对汉森提出的军事、政治、经济问题逐一回答，还对中国民主的前景进行了展望，认为“中国正在努力创造历史，而不是模仿历史”。汉森尤其关注毛泽东不久前发表的《论持久战》，毛泽东向他介绍了《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指出抗战必然经历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汉森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论持久战》主要观点的西方记者。1938年10月，汉森离开延安，他写道，“离开延安时，我对共产党只有一个信念：他们比中国其他任何组织都更全心全意地抗日”。

1939年初，汉森回到美国，年底出版了《中国抗战纪事》一书，记载了大量中国战场的信息。1942年起，在美国国务院援外部门工作。20世纪50年代遭麦卡锡主义迫害被迫去职。在农场工作几年后，汉森到缅甸、伊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国从事发展中国家开发工作，1972年至1978年任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主任，为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问题作出了贡献。

20世纪70至80年代，汉森多次来华访问。1981年访华期间，他将抗战时期拍摄的照片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并向中方提出了“沿长征路走一趟”的请求。经中方安排，1983年6月至7月，71岁高龄的汉森从江西瑞金到陕西吴起镇，重走了一遍长征路，实现了多年夙愿，也体现了他对中国历久弥新、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

被称为“外交核爆”的中法建交

□ 周绍雪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了建交公告，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份公告别具一格，语言简洁到只有两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然而，这短短两句话带来的影响，却深刻而持久，被西方舆论形象地称之为“一次外交核爆”。

（一）

中法建交之所以被冠以“外交核爆”，主要缘于当时两国所处的复杂冲突的国际环境和中法两国在各自阵营中的独特身份，再加上两国独一无二的建交方式以及突破以往的建交级别，使世界为之震惊。

中法建交时复杂冲突的国际局势和中法两国各自的诉求与困境，使两国的建交具有特别意义。二战后，在冷战的背景下，国际政治格局的突出特点是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剑拔弩张，尖锐对立。分属两大阵营的世界各国，其外交决策的自主权受到很大限制。美国和苏联作为各自阵营的领导者，很大程度上主宰着本阵营中各国的外交决策。中法两国是各自意识形态阵营里重要而又独特的一员。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国，自1949年建立，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一方面要应对资本主义阵营的主导者美国全方位的敌视、孤立和遏制，同时还要处理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者苏联在外交、军事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对立。1960年，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两国关系恶化。彼时的国际形势下，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四十几个，主要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邻的亚洲国家和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而且，当时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未能恢复，在国

际上发声的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上述一系列外交困境，促使中国努力寻找外交上的突破口。资本主义阵营中的法国，自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提出了“戴高乐主义”。这一主张旨在通过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法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面对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权统治，戴高乐极力维护法国的独立自主。1959年，戴高乐宣布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并反对美国在法国领土上存储核武器；1963年，法国拒绝签署由美国、苏联和英国主导的《部分禁止核实验条约》，该条约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美苏的核垄断地位；1966年，戴高乐宣布将退出美国主导的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法国的一系列外交举措，践行了戴高乐就任时说过的话：“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必须保持独立性。我重新执政以来，这就是我们的规则。”法国为摆脱美国的控制，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在试图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分属两大阵营的中法两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都在努力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两国都坚定不移地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并相继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两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求国家安全的做法，不谋而合。因此，在这样复杂交错、困难重重的时代背景下，中法建交这一惊人之举，在世界的意料之外，却也在两国的情理之中。

（二）

中法建交举世震惊，还缘于中法建交的方式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特例——法国是唯一一个在没有先行与台湾断交的情况下，中国同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台湾问题是中法建交进程中最棘手的一环，中法建交谈

判也因此一度陷入僵局。为此，周恩来总理亲自拟定了四套建交方案，最终双方以第四套方案达成一致，成功建交。第四套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在建交公报的措辞方面，中国政府同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不必加上“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字样。但是，中国政府会向世界发表声明对公报进行解释，阐明中法建交的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作出的。然后，在中法对此达成默契的情况下，法国与中国先行建交后，形成事实上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客观现实，以此自动结束其同台湾的关系。1964年1月27日，中法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交。1月28日，中国外交部即如约发表声明，向世界表达了上述立场，法国方面也如约对此默认以表示对中方声明的支持和肯定。台湾当局则被迫于2月10日宣布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至此，中法关系掀开了新的篇章。

中法两国的建交，是全方位地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且，建交公报中把“互换大使”的期限明确为三个月，这也是国际惯例中较为罕见的做法。不同于以往中国与其他西方大国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法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国家。这个“第一”，也使中法建交举世瞩目、意义深远。

中法建交这一时代的创举，在尘埃落定之前一直是秘密进行的，因此，肇路蓝缕后的简短公告，更让世界为之震惊。中法建交谈判自1963年10月开始，到1964年1月两国发布建交公报，历时三个月。其艰难历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北京谈判阶段和瑞士谈判阶段。北京谈判主要由周恩来总理和戴高乐总统的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来推进，重点解决中法建交中实质性和原则性的问题；瑞士谈判在时任中国

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和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波马歇之间进行，着重解决中法建交中具体的程序问题和方式问题。

（三）

中法双方以足够的诚意，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最终确立了双方都接受的建交方式。

中法两国突破两大阵营的桎梏成功建交，其中彼此成全的战略意义和由此给世界格局带来的深远影响，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围。中法两国用交流和对话突破了美苏控制的两极世界格局，在世界上树立了独立自主的典范，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进程。对中国来说，中法建交开创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先河。此后，众多西方国家步法国之后尘与新中国建交，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又一次高潮。如果把这一创举放到新中国外交的历史中，其对后来中国的一系列国际和国内重大事件中的政策选择都意义深远。中法建交可以看作是中国最终迈入国际社会的第一步。自中法建交开始，到中国重返联合国，继而中美关系正常化，再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是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的。面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逐渐融入并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对法国而言，中法成功建交提高了法国的战略地位，使法国可以与两大阵营中的大国直接对话，赋予了法国更多的外交空间 and 与美国抗衡的筹码，这也是法国追求独立自主的大国影响力的一次成功实践。中法建交，震惊了世界，也成就了中法两国反对霸权，对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坚定追求。



明代的绿洲丝绸之路

□ 张连银 阿小雯

折向西南翻过爽塔石（今三塔什山脉），绕过亦息可儿（伊塞克湖）东面，向西南过塔尔塔什大坂，喀喇乌只，取道北行溯喀修喀儿河西上到达塔拉斯河谷，沿河谷西行到达养夷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穿越养夷、塞蓝（奇姆肯特东）、达失干（今塔什干）、达里迷（今乌兹别克斯坦捷尔博兹）、撒马尔罕、八刺黑城（巴尔赫）、渴石（今乌兹别克斯坦萨赫里萨布兹）、俺都准（今阿富汗安德胡伊）、哈烈。此外，经哈密、吐鲁番、察里斯（焉耆）、库车、阿克苏、鸭儿看（今莎车）、撒里库尔（喀什库尔干）、越过帕米尔高原、塔里寒（今阿富汗西北迈马纳西南）西进，经八鲁番（今阿富汗喀布尔北帕尔万）、可里城（喀布尔），沿着喀布尔河谷，进入配夏哇（白沙瓦），经阿塔克（阿托克）、腊和儿（今巴基斯坦拉合尔），可达南亚莫卧儿帝国首都德里。明代丝绸之路最明显的变化是，前代一直很繁荣的途经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丝路南道衰落了，而在原来的中道和北道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道路，此外，在阿力麻里（霍城县西北）与吐鲁番之间还有一条不同于北道的道路。

明朝通过绿洲丝绸之路与西域世界的联系空前加强，绿洲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比汉唐丝路繁荣有加。明朝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主要采取“朝贡”与“回赐”形式的官方贸易。从洪武初年开始，西域的撒里畏兀儿、哈梅里、吐鲁番、火州、柳城哈儿、别失八里、哈烈、撒马尔罕、俺都准等处俱派出贡使向明朝朝贡，明朝也以回赐的方式赐给西域诸国内地所产物品。明朝与西域世界的朝贡贸易规模空前。双方贸易使团庞大，人数众多，尤其是明朝前期，使团少则几十、多则三四百人。永乐十七年，哈密向明朝派出的朝贡使团有290人，沙哈鲁使团有500多人。明朝亦派出庞大的使团携带大量白金、瓷器、文锦、纱罗、绢布等物品西使。天顺六年，京卫指挥等官员127名，各领白金、彩币等物随使马云等往西域诸国贸易。西域诸国朝贡贸易数额巨大，回赐数量众多。西域马是贡使贸易的大宗。明朝回赐的商品中茶叶占大宗，此外，绸缎、铁器、麝香、梭布以及其他中原生活用品也输入西域。除了以朝贡为主的官方贸易外，西域与明代的市场经济和私商贸易也相当频繁。

对明朝而言，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朝贡贸易，除了获得西域诸国朝贡的马匹及当地的土特产品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双方的朝贡贸易往来，明朝树立了在西域的政治影响力，维护了西北边疆的安全。西域诸国则借助朝贡贸易从明朝赚取了巨大经济利益，而且利用朝贡的机会强化同明朝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初，嘉峪关外的贡道并不安全，使臣屡遭遭劫，贡物被抢夺，梗塞贡路的状况时有发生。明王朝一方面派兵征讨，在嘉峪关外相继建立七个羁縻卫所，通过抚绥关外的羁縻卫所，保护商旅，维护贡道安全；另一方面，派使臣厚赏西域诸国，借助西域诸国的力量来维护贡道安全，善

朝来贡使。

明朝与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贸易中，义利冲突不可避免。西域商人假贡使之名夹带私货，贩卖人口，酗酒逞凶，骚扰驿递，违反明朝律法。在明王朝内部对朝贡贸易的质疑声中，明王朝开始规范朝贡贸易。明朝首先限制哈密、亦力把里、撒马尔罕、吐鲁番朝贡贸易的次数、人数，做到朝贡有期，遣使有数；其次，规范经嘉峪关进入河西走廊的西域贡使的路线、待遇，通过驿递系统护送赴京贡使经河西走廊、兰州、平凉、西安等地赴北京朝贡。再次，申明禁例，禁止官员、军民、店铺与西域贡使进行非法贸易，引诱贡使从事违法活动；最后，对于不能赴京，滞留在河西走廊的西域贡使，明朝提供专门居住的馆舍，贡使白天可在河西市场交易商品，晚上则被封闭在馆舍中，不允许与外界接触。西域贡使离境时，必须在嘉峪关接受稽查，如发现违禁物品则予以没收。

明朝置嘉峪关外不问，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将这等同于明朝不重视与西域世界的联系，也是一种误解。明朝主动招徕西域世界，通过朝贡贸易，保证了明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和西北边疆的安全，利用绿洲丝绸之路，以达到构建“益顺天心，永笃诚好，相与还往，同为一体”的目的。

